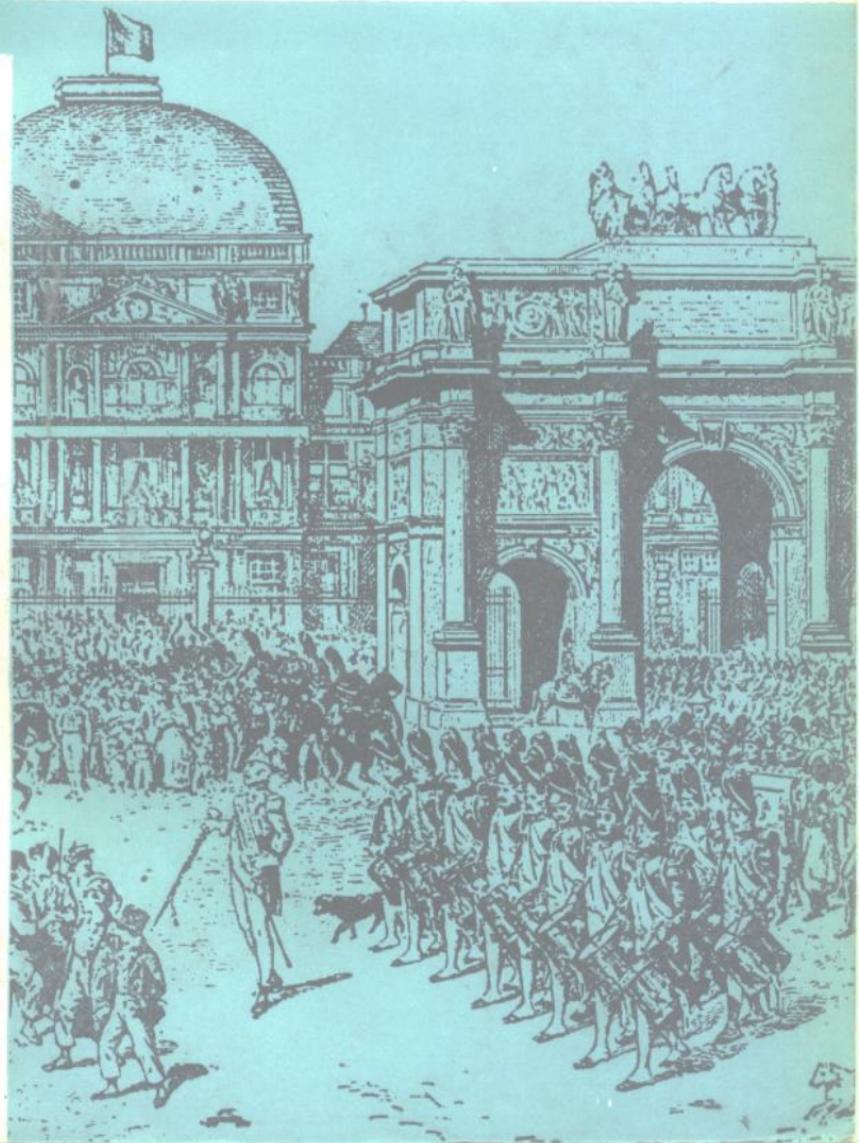


张德彝

随使法国记〔三述奇〕



一个中国人的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目击记。

K565.44/4



走向世界叢書

张德彝

随使法国记〔三述奇〕

左步青点 钟叔河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

张德彝
随使法国记〔三述奇〕

左步青点 钟叔河校
责任编辑：钟叔河
装帧设计：易 地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82,400 印张：9.75 印数：1—18,800
统一书号：11109·199 定价：0.89元



上图：张德彝画像。〔封面图
片：一八七一年的巴黎街头。〕

目 录

《走向世界丛书》总序 1

·文与其人·

巴黎公社的目击者

——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三述奇) 钟叔河 · 5

随使法国记(三述奇)	张德彝 · 21
序(孙家谷)	21
自 叙	23
凡 例	24
南海经行记	26
同治九年十月	27
同治九年又十月	39
同治九年十一月	66
同治九年十二月	84

普法战事记.....	87
马赛波尔多纪事.....	99
同治九年十二月	99
同治十年正月.....	118
同治十年二月.....	133
凡尔赛纪事	137
同治十年二月.....	137
同治十年三月.....	147
同治十年四月.....	166
赛后巴黎记	168
同治十年四月.....	168
同治十年五月.....	180
同治十年六月.....	198
同治十年七月.....	210
西海小游记	214
同治十年七月.....	214
同治十年八月.....	228
使事记	234
同治十年八月.....	234
同治十年九月.....	243
同治十年十月.....	256
归途记	269
同治十年十月.....	269
同治十年十一月	269

同治十年十二月	285
同治十一年正月	297

•图片•

1871年的巴黎街头〔铜版画〕	(封面)
张德彝画像	(扉页)
《三述奇》稿本书名页	(插页)
稿本记旺多姆纪念柱被毁事	(插页)
稿本记巴黎公社女战士被俘不惧	(插页)

总序

人们常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波音747时代，地球上各地之间的距离，确实好象越来越短；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可是，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用小米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胀裂开，就从里面取出丝来。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有种羊羔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上千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信的知识，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由此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何等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在人类文明史上，象记载

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一样，将永远铭刻着张骞、玄奘、鉴真、郑和、马哥波罗、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和民族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往往也就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平衡。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原始森林里徘徊。而自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渐渐地落后了。在西欧（后来还有美国和日本）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他亲身感到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外国隔开了。

封建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精神世界里闭锁了许多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顽固守旧派的办法是藏起脑袋学鸵鸟，象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那样，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就是这个徐桐，他在庚子年间焚香跪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自己父子的命却双双送掉了。林则徐、魏源等则不同，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那就是：学习外国的长处，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

未能亲身出国去考察，书的材料靠间接收集而来，难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不能不逐步让位给知识了。

林则徐、魏源之后，中国才有读书人走出闭锁的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游历和出使。容闳1847年留学美国，斌椿、张德彝等1866年游历欧洲，志刚、孙家谷1868年出使泰西，这是最早的。出国的人数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去的政府官员，但既然去了，就不会不接触近代的科学文化、政治思想，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

《走向世界丛书》专收早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关于西方的记述。毛泽东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从书所收虽不限于这一派人物的作品，总之都是近代中国和西方文化交流和政治关系的第一手材料，不乏历史价值和文学兴味，都是足以传世的。

值得指出的是：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国家虽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值得中国人学习，但资本主义的本质，总是要压迫剥削落后民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如何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怎样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拜都是错误的。对于某些书中流露的这类观点，我们将在介绍各书“文与其人”的专栏文章中，适当地作些分析，供读

者参考。

“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也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在1878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立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代后期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建立了先进的社会制度。但是，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快，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以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观察和体会，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学、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是为序。

编 者

一九八〇年七月

文与其人

巴黎公社的目击者

——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三述奇）

• 钟叔河 •

1871年是法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对普战争失败，皇帝被俘，第二帝国垮台，共和国成立，特别是出了巴黎公社这件大事，影响及于全世界。

和法兰西远隔重洋的中国，1871年是清朝同治十年，其时启蒙运动尚未兴起，第一代产业工人刚刚从乡下出来，巴黎公社的火光还没有来得及将他们的眼睛照亮，……

据《巴黎公社与中国》作者陈叔平研究，1871年中国对巴黎公社这件大事的报道，仅有外国人所办的《中国教会新报》和王韬所编的《普法战纪》，抄摘了几条欧洲报纸上

关于“法京民变”、“巴黎乱事”的新闻。以致当代法国历史学家贝尔热夫人，在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论文和讲演中，宣称中国在1927年以前，几乎未见到任何巴黎公社的反映。（均见北京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研究·巴黎公社专辑》，1981年3月出版。）

事实果真如此吗？

否！

1871年到法国的中国人

1871年1月24日（清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五日），“斯戛莽达”号轮船在法国马赛靠岸，有十来位中国官员和他们的随从人等一行下船。为首的是头戴红顶大帽，脑后拖着双眼花翎的“太子少保、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中国政府为了了结“天津教案”派往法国的特使。在崇厚身旁，跟着一位面目清秀、身材颀长的年轻人。他对于离船上岸的手续和码头上的一切，好象显得比旁人更为熟悉。这就是使团的英文翻译、“兵部候补员外郎”张德彝。这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已经是第四次进入法国了。

1866年，张德彝以同文馆学生的身份首游欧洲，写下了他的第一部游记《航海述奇》，其中讲述了他两次旅经法国的经过。1869年，他随中国第一个到西方的外交使团出国期间，再一次到法国，写了一本《再述奇》（收入《走向世界》丛书时名为《欧美环游记》）。这一回他第四次来到法国，从1月24日到12月10日，呆了差不多整整一年，从头到

尾亲见亲闻了法国投降、巴黎起义、凡尔赛军队攻占巴黎，以及对革命者进行大规模镇压等等历史场面，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写下了这部《三述奇》。稿本共分八卷，凡十四万言（此次用《随使法国记》的书名刊行）。作为现在所知唯一的中国人写的巴黎公社目击记，它否定了“中国人没有直接观察并记述过巴黎公社”的结论。这当然是张德彝本人始料所不及的。

张德彝事先并不知道会在法国碰上战争和革命。但他是一个关心外界事物、随时注意留下记录的有心之人。到达法国的当天晚上，他住在旅馆，就呼吸到了当时法国的紧张空气。“亥初，忽闻楼外乐声一阵。出而视之，共兵百馀名，乱步而行。有唱者，有泣者，有疾驱者，有缓行者，行人皆击掌而贺。盖当时法郎西与德义志两国鏖兵数月……”他的笔墨就立刻开始记述这一场战争了。

张德彝与崇厚和其他人不同。他懂得外语，又曾多次出国，比较了解西方的政局和社会。因此，当他有心观察和记录外国的情况时，他是能够找到渠道的。

在本书《普法战事记》一篇中，张德彝追述了普法战争的经过和法国政局的变化，写得井井有条，而且十分具体；比起《中国教会新报》那些转抄改写的报导来，很容易分出高下。例如：

（西历一八七零年九月）初二日，法、德大战于水塘（色当）城七昼夜，互有胜负。是役也，德军六十万，用枪炮百二十万。至是俘虏法军三十五万，夺获大炮四千七百门，枪三十万杆，踞地二

省。

至初六日，法君欲与德议和，德君不允。当日午刻，法君手举免战白旗，欲见德君；乃先遣一官，往送宝剑，以示相投之意。德君答云：“不能与剑对语。即欲议和，可令拿破仑（三世）自来。”未初，法君亲诣德营。德帅毕驷马（俾斯麦）与其大将何楠暗约，调军三十万，乘间突袭，与法军八万复大战于水塘城。法旋败绩，拿破仑遂被俘焉。……

初七日，巴里（巴黎）闻各处失守，国君被俘，众议改民政（共和）：……外部发福尔（法夫尔），外以冈北达（甘必大）为帅，内以屠额许（特罗胥）操兵，而民主（总统）执国政焉。君后（拿破仑三世的皇后）问众“可仍居巴黎否？”众云“不可”。遂携妻子逃往比利时，寻又入英吉利。

《普法战事记》主要叙述两国战事，但也接触到了巴黎人民的斗争。如补叙1780, 10, 9 巴黎之事：“有带红帽之乡勇（民兵）十万，名为‘红头’（此系沿用国内对广东农民武装的称呼，借指巴黎人民建立的自卫军）者，齐赴外部，伪以击退德兵为名，欲借改民政而作乱。”这里虽然把人民起义称为“作乱”，但毕竟没有使用“匪”、“贼”之类污蔑性的称呼。张德彝在涉及东道国发生的事情时，是尽量保持着客观的立场。

《普法战事记》之后为《马赛波尔多纪事》。第一天记：“法邦外部大臣发福尔亲到卫酒（凡尔赛）德营，与毕驷马商议停战二十一天。毕对云，如欲停战，须依德营十五款”。在投降条约签字之前，“红头”已经“满街喧闹”，并将拦阻的“看街兵”“投诸河中，掷石如雨”。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九日记：“因为‘红头时时反乱’，会堂（国民议会）和

外部都迁移至波尔多，“各国驻扎公使亦多因而移去焉”。此外，并记载了迪尔（梯也耳）被国民议会选举为“伯理奎天德”（行政首长）一事。一星期后，他们一行也以外交人员身份，从马赛到达波尔多。

张德彝在波尔多住了四十来天。从他的记载看，法国外省的官吏、军官和商人们，此时生活还比较平静。这说明对德战争的失败，并没有给统治阶级带来多少痛苦，这个阶级也并没有投入“全民抗战”。在马赛的时候，他就有过这样一段记事：

前日来拜之武官名傅达义者，系奉命来此与兵购买鞋袜者。彼尚游玩看剧，不以官事为重。斯时城（巴黎）虽被困，王虽被擒，而闾阎市廛，仍是朝朝佳节，夜夜元宵，鼓乐喧天，车马震地，可谓燕雀不知大厦之倾也。

可是，普通法国人民的情况却与此不同。在波尔多，张德彝去到旅馆对面人家小坐，见到从巴黎逃出的难民。房东的儿子原在巴黎从军，已经四个月没有家信。房东太太讲到儿子，忍不住伤心哭泣。这样的情景，在他平时接触的达官贵人中是见不到的。后来，在波尔多还有巴黎难民向中国官员求乞。想起过去在北京见到乞丐向洋人讨钱的情形，张德彝这位旁观者，也不禁感慨系之了。

旁 观 者 清

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张德彝奉崇厚之命先进巴黎，为中国使者寻觅馆舍。这时“旅舍大半歇业”，多“内藏‘红

头”。第二天，也就是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起义就正式爆发了。

巴黎公社参加者、法国历史学家普·利沙加勒著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被马克思誉为“第一部真实可信的公社史”（1876年9月23日给白拉克的信）。其德译本附有《大事年表》（以下简称《年表》），3月18日这一天所记大事是：

维努亚企图在拂晓的时候夺取蒙马特尔的大炮，军事占领巴黎。巴黎人民起义。士兵们拒绝射击，同人民联欢。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将军被他们的士兵枪杀了。

晚上，梯也尔命令政府的一切机关撤出巴黎。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掌握政权。东布罗夫斯基从里昂回到巴黎。

现在让我们看看张德彝当天和次日的记述：

二十八日戊午，晴。……租寓已定，并告以如何安排修饰。……亥初回寓。闻是日会堂公议，出示逐散巴黎各乡民勇（指巴黎人民组织的国民自卫军）；又各营派兵四万，携带火器，前往北卫、比述梦、苇菜暨纲马上下四路，拟取回大炮四百馀门，因此四处皆系乡勇看守。官兵到时，乡勇阻其前进。将军出令施放火器，众兵抗而不遵，倒戈相向。将军无法，暂令收兵。叛勇犹追逐不已，枪毙官兵数十人。武官被擒二员，一名腊公塔（勒康特），一名雷猛多（克列芒·托马），亦皆以枪毙之。戌正，叛勇下山，欲来巴里。一路民勇争斗，终夜喧闹。奔飞禀里使，请仍在波尔多暂驻数日，俟军务稍定，再禀移入法都。

二十九日己未，晴，凉。闻昨夜叛勇已入巴黎，至王宫左万洞坊（旺多姆广场）之铜柱下，约千万人，哗言鼓噪，声言将吏、兵二部大僚，并民勇将军、巴里提督、按察司皆改用其党。各官畏惧，皆避往卫酒（凡尔赛）等处，巴里遂无主矣。叛勇行令，官兵皆倒